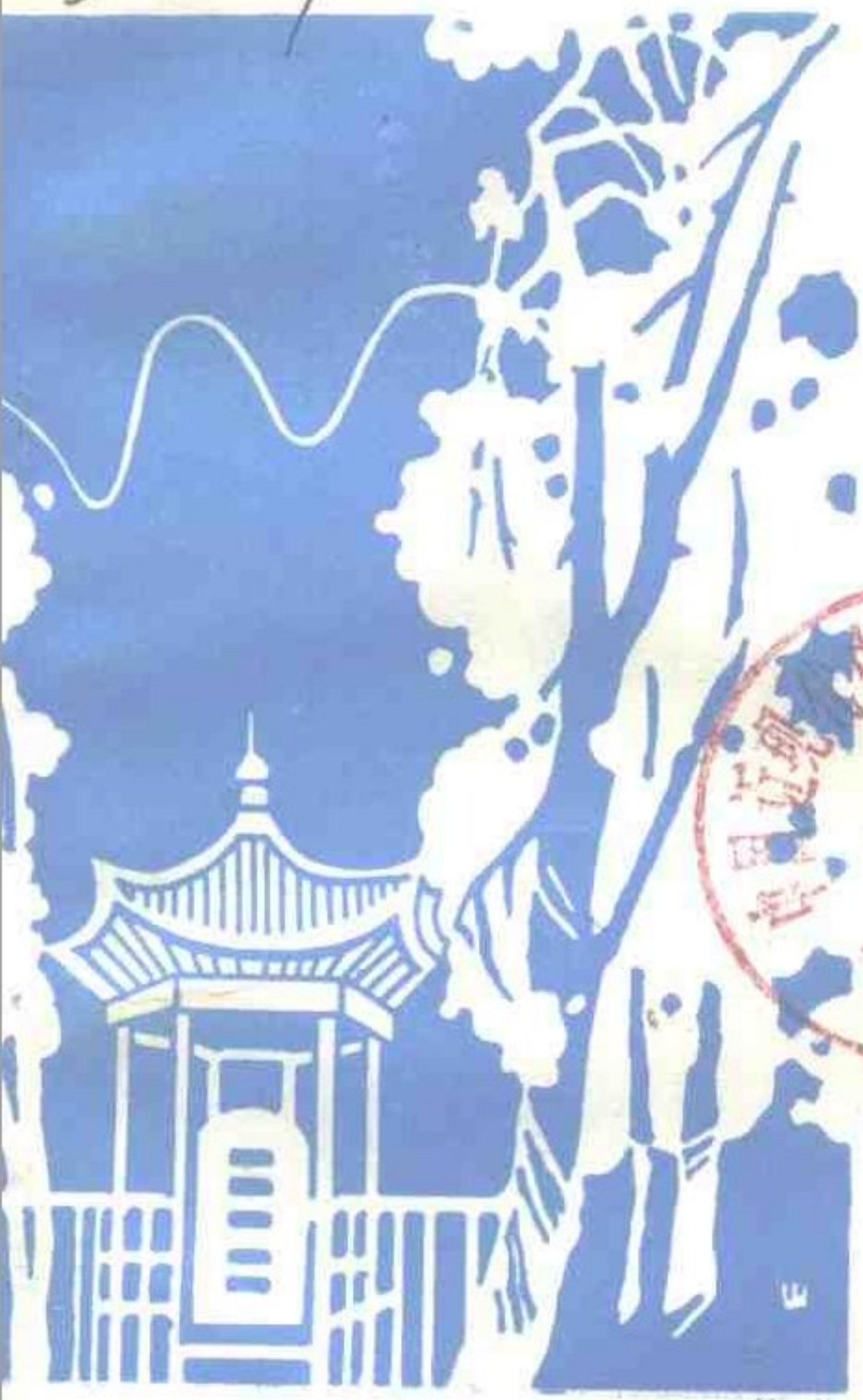
2917 07



勉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China

勉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八月

China

前　言

以史为镜，鉴往知来，光前裕后。

《勉县文史资料》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集累历史资料，并望能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承前启后，开拓前进。

本刊所选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资料可能不尽翔实，加上编辑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提出补充和订正。

中共勉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勉县县志办公室，为本刊提供了有关史料，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在此特表谢意。

“春来无处不飞花。”勉县建设，方兴未艾；改革之势，波澜壮阔。县政协编辑出版《勉县文史资料》期望能为振兴中华，振兴勉县，贡献绵薄之力，敬希各界人士热心关注，踊跃投稿。

——编　者

一九九二年八月

China

目　　录

前　　言
勉县武侯祠唐碑考 ……陈显远（1）
杨育才探亲记……李森荣、陈福祥、史建国（15）
革命先烈付钦德、唐庭世、谢鸿儒
　　的几件事 ……胡益汉（22）
于佑任先生轶事 ……黄松年（28）
杨虎城将军在长林镇……黄松年（30）
郭杰打地丁 ……李恒泰（32）
乡贤书法家马鸿逵 ……张清泉（36）
解放前的勉县民众教育馆 ……张清泉（38）
汉师勉县分校学生被胡宗南部骗往
　　四川经过 ……张清泉（44）
勉县红灯教调查 ……张清泉（46）
民国时期勉县人祸记……郭志仁（50）
勉县妇女缠足始末 ……晏存忠（54）
勉县民俗“丧葬制”概述 ……张清泉（56）
过去葬仪“三献礼”与“过
　　夜礼” ……张清泉（62）

China

春节文娱——竹马子 …… 张清泉（68）
阜川地方及名胜 …… 张清泉（71）
勉县磨山坡与石磨开采 …… 张清泉（80）
老道寺与华阳河 ……景海珊（85）

勉县武侯祠“唐碑”考

陈 显 远

今陕西汉中地区勉县西四公里处，有一座明建的武侯祠，座南向北，背濒汉水（古称沔水），面临公路，七院五十六间庙舍，面积约三十亩，规模宏大，壮丽美观。推其前身，系蜀汉后主刘禅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允之请，于“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春，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定军山下诸葛亮的墓所。其年冬，邓艾入川，蜀汉即亡。因此可知勉县武侯祠，较成都武侯祠早建约五十年，为全国各地现存武侯祠最早建立者。

勉县武侯祠始建于汉水南十里，定军山下诸葛亮墓所，其后屡经培修、重建，至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八年（1513年），乃迁建于汉水北，距墓十里，即为今祠。

今祠内碑碣林立，惟以“唐碑”为最早，它是中唐时期，在诸葛亮墓所重建武侯祠后，于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刻

China

立的，较成都武侯祠的唐碑（刻于宪宗李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早刻十四年。以刻立时间而论，又为全国现存武侯祠石碑之冠。估计它是于明正德八年，随勉县武侯祠的迁建而迁至今祠的。

这通唐碑，园额、龟座，通高二百三十七、除额一百五十九、宽一百一十二、厚二十九厘米，二十三行，满行三十七字，共计八百多字。惜因刻时较早，历年颇久，经风雨剥蚀，间有泐字，又经后人改凿补刻，造成混乱。所补错字，需要考证；加之前代金石学者，对此碑文尚有未能全部理解而存疑者，这次拟一并考之，现将原泐字用方框占位，框后用圆括号填入补字，全文录出如下：

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铭并序

山南西道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尚书、刑部员外郎、□□御史沈迥撰；节度推官将仕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元锡书。

皇帝御极，贞元三祀，时乘盛秋，府王左仆射冯翊严□（武）总帅文武将佐，洎策轮突归之旅，疆里西鄙，营军沔阳，先声施于种落，伐谋息其狂狡，于是威武震叠，虏骑收迹，塞

China

垣萧条，烽[redacted]（燧）灭焰，士无保障之役，马无服辕之劳，重关施柝，边谷栖野，我师惟扬，则有余力。乃升高访古周，览原隰，修敬兹庙，式荐馨香，光灵若存，年祀浸远。虽萧鼓忻奏，邑里祈禳，而风雨飘摇，祠堂落构，土阶衡数尺之崇，庭除无衮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礼，牲玉不能备陈。颓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苏互径，麋鹿走集。冯翊曰："丞相以命世全德，功存季汉。遗风余烈，显赫南方；丘垅□（南）山，实在兹地。荒祠偏倚，庙貌诡制，非所以式先贤崇祀典也"。乃发宗府，征役徒，撤编菅，雉丛薄；是营是葺，众工群至。缭以高墉，隔阂刍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英）英昔贤，象设如在；翼翼新庙，日至而毕。顾谓小子，扬摧前烈，铭于庙门曰：在昔君臣合德，兴造功业，有若伊尹相汤，吕望兴周，夷吾霸齐，乐毅昌燕，是八君子皆风云玄感，垂裕来世。尝以为阿衡则尊立圣主，天下乐推；尚父则止仇□□（独夫），诸侯同举。管氏籍强齐之力，宗周无令王；乐生因建国之资，燕昭为奥主，君臣同道，仅能成功。惟武侯遭时昏乱，群雄兢起，高、光之泽已竭，桓、灵之虐

China

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区区一州，介在山谷，驱羸卒，辅孱主，衡击中原，撑拒强敌，论时则辛癸恶稔；语地则燕齐势胜。迁夏、殷者，未可校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将席卷西邑，底绥东周，祀汉配天，不失旧物矣。洪伐彰彰，宜冠今古，倬轶前烈，其谁曰不然？武侯名迹，存乎《国志》，今之□（群）书，姑务统论，大略叙我新意。至于备载爵位，追述史传，非作者之愿也，今则不书。其铭曰：桓、灵济虐，云海横流。群雄蝟起，毒蜇九州。天既厌汉，人思代刘。沸渭交争，存亡之秋。其谁存之，时惟武侯。伊昔武侯，跡足南阳。退藏于密，不耀其光。有时有君，将排坛氛。鱼脱溪泉，龙跃风云，先主赞绪；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清尘。前哲后贤，心迹暗沦。建兹新庙，式是梁珉。

大唐贞元十一年岁在乙亥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建。镌字□□□□明。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蜀汉末年始建的武侯庙，经过五百多年，至中唐时期，已经坍塌破烂不堪，不能再做祭祀诸葛亮的场所，乃在原

China

地重建了一座武侯庙，故名“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这通唐碑，就是记叙修建“新庙”的动机和经过情况的。

关于后人对碑文磨泐所补的字，有的按文意尚属可从，有的就补刻错了。特别是把当时倡导建修新庙的地方长官名字补错，以致影响自清初以来，许多金石学家聚讼不休。

碑文第一行：“皇帝御极，贞元三祀（三年，７８７年）时乘盛秋，府王左仆射冯翊严□，总帅文武将佐，洎策轮突归之旅，疆里西鄙，营军沔阳。……”不幸“严”下一字磨泐，有人猜想是中唐时期权威人物严武倡导建修的新庙，便把“严”下那个泐字补刻为“武”。从此，有些盲从者便说是严武。如清康熙六年（1667年）重修的《陕西通志》和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修的《汉中府志》“祠庙”类俱载：“沔县武侯祠：唐贞元十一年，佐仆射严武增修，有记”；道光初，祠中方丈虚白道人李复必编纂的《忠武侯祠墓志》著录此碑文时，也直称为“严武”。说明自清初以来，多数地方志，一致附和“严武”之说。

虽然有些著录者心知其非，没有苟同“严

China

武”之说，但只含糊其词，未能破的。如康熙《陕西通志》“艺文”类著录此碑文时，将“冯翊严武”改为“冯翊严氏”而已。

也还有明眼人敢直斥补为“严武”之非，而另提一人。但所提之人，亦不确切。如清乾隆时（1736——1795年），两度做过陕西巡抚的毕沅，在他编的《关中金石记》卷四，《诸葛武侯新庙碑》篇载：“文称：贞元三年，府王佐仆射冯翊总帅者”者，谓舒王（李）谟为荆襄江西沔鄂节度诸军行营兵马元帅也”。毕沅认为倡修新庙的并非严武，看对了；但他强调是唐宗室舒王李谟，则错了。较毕沅稍晚一二十年的金石学家王昶，对毕沅认为是“李谟”之说，提出了非议。

王昶在他编的《金石萃编》卷一百三，《诸葛武侯新庙碑》载：“《关中金石记》定为舒王谟。《唐书、宗室传》“舒王谊，初名谟，昭靖太子子，德宗爱其幼，取为第二子”。其为沔鄂节度，在李希烈反之时，正贞元三年事，宜乎合矣；而亦未尝有佐仆射之官，且与冯翊严□亦无着。希烈之乱在淮蔡，舒王谟为节度在沔鄂，即今湖北汉阳州，非陕西汉中府

China

之沔县，则《关中金石记》亦不确也。”

王昶接着又批判将此唐碑定为“严武”之讹：“碑云：‘俯王左仆射冯翊严□……’，下泐一字，《陕西通志》云：‘唐贞元十一年左仆射严武增修有记’，即谓是碑所泐者乃‘武’字也。武为挺之之子，《两唐书、传》称挺之为华阴人。严氏有冯翊、华阴二望，碑称‘冯翊’者，举其旧望也。惟碑有‘佐仆射’之官，《两书严武传》所无；且《旧传》称武卒于永泰元年（《杜工部年谱》亦同），不应贞元三年严武尚在，是《陕西通志》与碑不合”。

王昶反对碑上补刻为“严武”及毕沅定为“李谟”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因为严武在当时虽是权威人物，但其官居东川节度使，汉中勉县非其辖区，不会越境来倡修勉县武侯庙。特别是严武卒于唐代宗（李豫）永泰元年（765），下距修勉县武侯新庙的唐德宗（李适）贞元三年（787年），已二十二年；再下距刻立此碑的贞元十一年（795年），就整三十年了，故与严武无关。

再以实物验证。现在碑上正文第一行

China

“严”下所补之“武”，字形拙劣；尤其把“武”字的一捺，划了两道，明眼人一看便知其误。更可证者，第一行补刻之“武”，恰巧与第二行原有“威武震叠”之“武”字并列，两相比较，其误跃然石上。

王昶虽对碑上补刻的“武”字提出疑问，但他又犹豫地说：“严氏有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二望，碑称冯翊者，举其旧望也”。“望”是门族、籍贯。王昶既提出碑补作“严武”不确，但又怀疑严武的旧籍在冯翊（这个问题，留在后面谈），模棱两可，未作断定，更没有提出这通唐碑上到底应该是严谁？

据我考证，初步肯定唐贞元时期，倡修勉县武侯新庙的是严震，如果要补碑上“严”下的泐字，应补为“震”，根据如下：

古代惯例，凡建修大型祠庙，一般都是地方长官作倡导，即是别人倡导，也要归功于地方长官，挂上他的头衔。当中唐时期，今汉中地区为山南西道，道治南郑（今汉中市），而道的最高行政长官节度使，严震自唐德宗建中时期（780——783年），至贞元十五年（799年），一直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China

据《新唐书、严震传》载："建中中，剑南黜陟使韦桢，状（严）震治行为山南第一。乃赐上下考，封郧国公。治凤十四年，号称清严，远迩咨羡，迁山南西道节度使"。

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李适为避泾阳兵乱，由长安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兵跟踪逼迫，李适在奉天站立不住，于兴元元年（784年）二月，打算逃到汉中避难时，"（二月）丙寅，上将幸梁州（即汉中），山南西道节度使盐亭严震闻之，遣使诣奉天奉迎"（《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贞元十五年，799年三月）癸巳，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薨"（同上书卷二百三十五）。这说明严震住山南西道节度使垂二十年，修庙，刻碑，都在严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任期中。再，今勉县东距当时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南郑，仅百里之遥，是严震的近畿属地，严震在勉县倡修武侯新庙，是势所必然的。

现在来谈谈"冯翊"问题。王昶既然批驳了碑上补刻为"严武"的错误，但又把碑上"府王佐仆射冯翊严□总帅文武将佐"的"冯翊"理解为严武的旧籍贯，以致他举棋不定，

China

难下断语。我以为“冯翊”是“冯翊郡王”的略语。因严震是四川盐亭人，与陕西冯翊无着，当德宗逃难到汉中时，严震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护驾有功，德宗对他“寻加检校户部尚书冯翊郡王”（《新唐书·严震传》）。这就足以说明碑称“冯翊”者，即严震被封为“冯翊郡王”无疑，进一步说明“冯翊”是爵号不是籍贯。

王昶又说：“惟碑有“左仆射”之官，《两书、严武传》所无”。但《新唐书、严震传》却有：“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不是“左仆射”之官号是什么？

据上所谈，这通唐碑记载勉县武侯新庙是严震倡修的可以定下来。但能不能对前人把“严”下磨泐了误补的那个“武”字，改为“震”字呢？我认为不能。因为古代撰文的惯例，对所颂扬的人，不能直书其名，以示尊敬，这是常识；何况此碑文作者沈迥，给他的上司严震歌功颂德，更不能直书其名。我以为原来碑上应该是个“公”字，现在从拓片上透过后补的“武”字细看，“公”字的残痕，犹依稀可见。如果要改，就应该改为“公”字，连起来，则为“府王左仆射冯翊严公”，便情通理顺了。

China

正文第六行“丘垄□（南）山”句，“丘垄”下泐一字，补刻为“南”字，我以为不妥。因“丘垄”指坟墓，诸葛亮的坟墓在定军山，怎能说成“南山”？且“南山”是泛指，不具体。应该补为“军”字。联系上下文意，即“丘垄军山，实在兹地”，译成现代话，便是“诸葛亮葬于定军山，坟墓就在这里”，语意便通顺了。

正文第十行“止仇”下泐二字，补刻为“独夫”。王昶《金石萃编》引《竹崦盦·金石书目》云“‘止仇’下旧本已泐，今作‘独夫’二字，不可从”。

我以为“独夫”二字，既不可从，另拟易作“暴君”二字。联系这一段上下文为“尝以为阿衡则尊立圣主，天下乐推；尚父则止仇暴君，诸侯同举”。其“阿衡”指伊尹，“尚父”指吕望。若以“暴君”对上句“圣主”，则排偶、语意都较通顺了。暂拟改于此，质诸高明。

碑文还有一个前人不理解的悬案，今并释之。如文中有“在昔君臣合德，兴造功业，有若伊尹相汤，吕望兴周，夷吾霸齐，乐毅昌

China

燕，是八君子，皆风云玄感，垂裕来世”一段话，这是把诸葛亮比作前代贤人的赞语。王昶在《金石萃编》的评语中，对“八君子”一词，持怀疑态度。他说：“碑叙伊尹、吕望、夷吾、乐毅只四人，而云‘八君子’，亦不可晓”。再如康熙《陕西通志》对“八君子”也存怀疑，它在卷三十二“艺文”类，著录此碑文时，竟含糊其词地改为“是数君子”。

我以为如深究文意，对“八君子”之说不难理解。因碑文明明载有“在昔君臣合德”之语，那么，加上伊尹的君商汤王，吕望的君周武王，夷吾（管仲）的君齐桓公，乐毅的君燕昭王，四君四臣不是“八君子”是什么？

关于这通唐碑的撰、书人问题，王昶在《金石萃编》的跋语里说：“此碑撰文者沈迥，书者元锡，两《唐书》俱无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元）锡字君贶，与宰相元桢同系’，只载其官淄王傅，而此碑结衔，乃为节度推官、将仕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又据《韩文考异》：‘衢州徐偃王碑，韩愈撰，福州刺史元锡书’。是锡又尝官福州刺史矣”。

我再补充一条资料。唐、韦绚《戎幕闲

China